

“北大宿舍聊天”爆火下的身份政治與性別治理

雙瞳，潮思，[新潮沉思錄](#) 2023-03-01

最近，在一二線城市青年群體中頗有影響力，以擅長製造互聯網行為藝術爛活著稱的新媒體機構“新世相”又成功整了一次活。相信不少讀者已經在 B 站看過這期名為《北大宿舍聊天×上野千鶴子》的視頻以及各平臺上的相關評價和聲討。由於視頻中主要負責提問的，打著北大畢業人設，實際多年靠婚姻話題恰黑紅流量飯的 UP 全嘻嘻的問題和表現過於愚蠢，讓不論是支持激進女權理論還是批判激進女權理論的觀眾都陷入了抓狂的情緒當中。

與這三位北大女相比，上野老師在視頻中溫柔耐心的回答與從容的談吐自然引發追捧。隨著該視頻的爆火，全嘻嘻引發廣大女性主義者集體聲討，同時又掀起一波上野千鶴子熱潮，《厭女》以及其新書《始於極限》等被反復推薦。

沉思錄的讀者們可能還記得筆者去年那篇文章 [《羅訴韋德案被推翻後，重新思考左翼，性別與身份政治》](#)（推薦讀者看完本文後可以重新看下之前這篇），筆者花了不小的篇幅梳理了女權主義理論史上關於“性別操演”與“社會正義”之間的分歧，國內這幾年推崇上野千鶴子現象的原因及其理論的一些問題，身份政治極化的趨勢與第三世界視角對激進女權主義的批判等等。

當筆者看完這個被人稱為“世界名畫：上野千鶴子的異世界歷險記”的視頻及其衍生的種種互聯網景觀後，筆者覺得是不是有必要就上一篇文章的觀點再寫些什麼。

就在這時，筆者看到某知名青年類公眾號又跟進整了個活《上野千鶴子救不了中國女人》，這個活就更讓筆者崩不住了。這篇文章可以說很生動的展現了國內當下一些以女性群體為經營目標的內容輸出者的“精緻”。

當“媒介資本權力”與“知識權力”合流

這篇文章確實提出了一個全網噴全嘻嘻背後應該掰扯的問題：為什麼三位北大畢業的，自認為是女性主義者的精英女性會擔心因為走入婚姻而墜入女性主義者的鄙視鏈底端？（這個底端在互聯網上常常以被攻擊為“婚驢”，“嬌妻”等形式出現）

如果你真想掰扯這個問題，那首先你要澄清，這又是一個新世相策劃的事件營銷，而且如全嘻嘻，到底是一個普通的“女性主義者”還是一個以中產和精英為受眾群體的恰流量輸出者？事實上，這個“世界名畫”的構建者新世相與“北大女畢業生”，一者作為“媒介資本權力”的表徵，一者

作為“知識權力”的表徵，這兩者結合進行事件營銷產生的內涵遠複雜於這個視頻的對話內容本身，把這層營銷性的包裝拋掉，看到“媒介資本權力”與“知識權力”二者如何作用於身份政治與性別議題上，我們才可能針對一些有意義的問題討論。

然而這篇文章還真就借全嘻嘻的言論表現有模有樣的分析起“精英女性為什麼這麼焦慮，這麼怕輸”，然後熟練的帶入到父權制異性戀婚姻和女性主義的衝突，”厭女“氛圍”對女性的影響這些起手式，認為“女性主義者內部之所以分出了鄙視鏈，分出了三六九等，根子上還是父權制結構和厭女思維的影響。

我為什麼說這樣的內容輸出者”精緻“？TA 提到了一次階級，承認像全嘻嘻和 TA 們這樣的人已經是”既得利益者“，”中國城市女性剝削鄉村女性“，顯然知道階級問題在這裏是無法回避的，但階級問題在這裏異常的模糊，而吊詭的是，這種語境之中的階級問題往往是跟“東亞性”“中國性”捆綁的（這種模糊和吊詭在筆者上一篇文章中已經討論過）。在表達了一下”女性主義的天平應該像底層傾斜“之後，就繼續回到對父權結構和厭女氛圍的批判上。

這種精緻還在於，看到了問題，但提出問題不是為了回答問題，而是回避自身可能存在的問題，文章最後的部分基本上就不是在分析問題了，將問題以共情煽情的形式統統歸罪於自己的批判對象上，就完成了這樣一次輸出。

我不知道這些內容輸出者是不是完全不知道有群體極化這種現象存在，還是對此避而不談，或者認為任何一種群體現象的原因都可以歸結到父權制與異性戀婚姻上。這兩年稍微有心在如小紅書等平臺上觀察一下就知道，恐懼於因為結婚生子或者選擇作全職媽媽而被言論歧視、人身攻擊這件事情，真輪得到全嘻嘻這樣搞出冠夫姓行為藝術的“女性精英”來說嗎？有多少已經努力實踐男女平等、婚姻平等的普通女性，在小紅書這樣的平臺因為這些事情，因為不願附和極端言論而莫名受到謾罵攻擊，導致越來越不願意在網絡平臺上發言，選擇做沉默的看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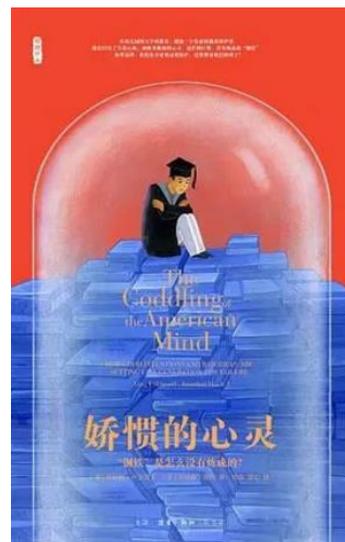
關於當下全球性的群體極化現象，我們過往已討論過很多，這種極化現象是只存在於互聯網女性主義群體圈子中嗎？如果不是，那這種文不對題的討論顯然對消除鄙視鏈沒有任何作用。

再議身份政治：嬌慣心靈與性別治理

筆者在上一篇文章《羅訴韋德案被推翻後，重新思考左翼、性別與身份政治》中將上野千鶴子與波伏娃劃歸為當代中文互聯網女權主義文化消費（原文是知識崇拜）的兩大代表之一（另一個是波伏娃）。

之所以將她歸類到這一點是因為就筆者個人的觀察而言，很多波伏娃與上野千鶴子的文化消費者只是通過“下單”這一消費行為完成某種可以稱之為“信息拜物教”祈禱儀式，更有甚者恐怕買了也不會看完，只是通過一些被算法製造的信息繭房推薦而來的 KOL 所發佈的隻言片語完成一次又一次的情緒爆發與概念強化罷了。

過去，筆者曾傾向於用所謂“政治極化”來解釋在互聯網輿論與現實中愈演愈烈身份政治。事實上，這也不是筆者的獨創，畢業於斯坦福大學法學院的格雷諾·盧金諾夫與賓夕法尼亞大學社會心理學博士喬納森·海特合著的《嬌慣的心靈》一書中也採取了類似的說法：在許多大學，校園文化在意識形態上已經變得整齊劃一，這使得學者群體很難自由追求真理，同時也傷害到學生群體，讓他們失去從形形色色的思考者那裏學習的機會。



極右翼和極左翼的分子一茬接著一茬，兩個陣營相互挑釁，雙方的仇恨越積越深。社交媒體已經使政治分歧的激情升格為一種新興的“揭發文化”（嗆聲、踹共、叫戰 callout culture）；講者說得用心良苦，但有些學生就是不領情，甚至惡意曲解，於是乎，講者在校園內受到公然羞辱。

新媒體的平臺和表達方式使公民們退回到自我確證的保護泡中，生活在氣泡內，他們開始以壞的惡意來揣測敵對方，而在那些意在傳播噪音並收割分裂的分子和網絡操作者的鼓動下，他們原本的意向會得到確證，甚至進一步放大。

可惜的是，當學生之外的、高高在上的大學教授（正如上野千鶴子自己）與遙不可及的議員老爺／奶奶（正如 AOC 與老畢登）們出於各自的政治需要選擇站臺這些被認為是擁有“嬌慣的心靈”的大學生們的時候，格雷諾·盧金諾夫與喬納森·海特所訴諸的對技術主義的反思和精神分析式的治療建議已經缺乏說服力，更嚴重的說這本身就會被“進步主義”大學生們和“進步主義”政客指責為“爹味說教”從而失去批判能力了。

因此，倘若我們僅僅將批判的視角維持於與這些“嬌慣”同源的方法論中（精神分析與二戰後歐洲智識階層反思理性主義本就是解構主義誕生的基礎），是無法真正對抗這個正在且一定會進一步撕裂社會的理論的。

我國臺灣地區“解嚴”後最知名的女權主義學者，為臺灣地區的婦女運動、性解放運動做出過突出貢獻的何春蕤總結了我國臺灣地區的經驗，將當代這種充斥在新興市民階層文化消費者當中的、高度保護性的、法理化的女性主義運動稱之為“性別治理”。



在她看來，這種由於強力的國際普世話語及其具體力量的介入，迎合了我國臺灣地區以及我國二線城市以上較發達地區的中產知識階層女性的認知與關切的“性別治理”已經不再是過去“性別平權”的領域，而是一種曾為女權主義理論所反對的制式的中心化的性別權力分析。這個顯然可以被劃歸為第三代女權主義範疇的範式，

這個堅持性別是最根本塑造社會權力差別的原因的範式，這個相信男性暴力是性別關係的核心形態的範式，有著清晰的西方源頭。

何春蕤指出，1985年非洲奈洛比世界婦女大會之前，非歐美世界的婦女團體就算提到婦女和暴力的議題，都是放在國家發展、社會正義、世界和平的大脈絡裏討論，認為性別暴力有其結構的、軍武的、國際的激化因素；可是來自歐美的婦女團體卻越來越主張採用「歧視」、「平等」和「權利」等等抽象理念來把「性別暴力」凸顯成為一個獨特但是普世而且急迫需要處理的現象。

1990年代末蘇聯解體，後冷戰權力佈局展開，CEDAW（《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於是跨國召開世界級會議，組織起龐大的 NGO 群體，積極把女性承受的暴力描繪成根本而核心的人權議題，強勢要求各國按照國際公約確實修法立法，設置同樣的政策和架構，以保障／保護女性及兒童的人身安全。

最近兩年以影視名人為先鋒的#MeToo 運動更進一步加快了將性別議題聚焦於特定性罪行（如性侵害、性騷擾等）的趨勢。由於受害者主要是女性，這些罪行很輕易地被女性主義理論歸因於性別關係的普世結構，被描述為男性陽剛的核心性質與典型呈現。這種特別在知識女性間逐漸普及且深化的「性別成見」以及對男性的「歧視和刻板印象」，透過社交媒體和大眾媒體的擴散震盪，使得大眾對女性和男性的性別認知與想像越發狹隘而固定，也已經不意外地引發了自認低層而受害之男性群體的不滿與抗拒。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出，即便女權主義的理論源頭會追溯到左翼、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但是當代女權主義的普世化實踐恰恰是隨著全世界範圍內社會主義退潮而進行的。今天，大部分即便是在政治站隊上選擇了最後的社會主義大國的中文互聯網女性用戶，也仍然熟稔的運用著第二代、第三代女權主義理論構建出的種種用語與概念（筆者甚至真的見過為了吵贏而表示自己願意認同自己是個直升機的人），範式化就是在這些細節當中體現的淋漓盡致。

這種範式，B 站 UP 主未明子將其稱之為“布爾喬亞女權”，而從這個命名，我們可以看出，固然第三代女權主義將自己打扮成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樣子，但實際上它對資本主義、對新自由主義從來是一種卑躬屈膝的態度，因為這種理論的受眾腦海中所呈現的是一種非勞動的、精緻的、在小提琴伴奏下與查理·考克斯所扮演的夜魔俠一起翩翩起舞的消費主義圖景。

得益於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以北上廣深新興城市人口為代表的群體的文化需求激增。與之相對的，則是自 80 年代後蘇聯於中國大陸就在各個領域方面“去意識形態化”，在這個前提下，因為產生了經濟交流而必然產生的文化交流中，這種顯然帶有國際政治支撐的“去政治化／再政治化”意識形態，就輕而易舉的通過各種媒體操作、國際公約、跨國 NGO、文化消費品、全球風潮等，席捲了被“去意識形態化”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年輕人的腦海，其背後是特定的西方意識形態與政治利益。

不客氣的說，當筆者在朋友圈看到大量的符合我們上面“中產階級知識階層女性”描述的人像是被“一鍵操控”後集體轉發媒體報道的、有關伊朗“進步女性”減掉頭髮抗議伊朗執政當局行為的時候，這種真正的“統治”已經形成了不容忽視，乃至急需批判乃至對抗的情景——何春蕤直言，仔細檢視各地發生“顏色革命”的緣起脈絡和擴散，就可以看到國家地緣政治與國際媒體力量涉入所謂“全球公民社會”的諸般操作。

甚至不僅僅是伊朗，從還在戰火中起伏的烏克蘭到被華納“開除哈籍”的 JK 羅琳再到我們每天所消費的各大媒體平臺，這種通過暴力和霸權來達成的“普世價值”儼然已經在“議程設置”領域上獲得了獨佔優先乃至不容置疑的地位。

這種披著“性別平等”的皮、行“性別治理”之實的範式展現出其無限上綱，罔顧國情世情人情的特點，在有關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性糾纏等等議題上都形成政治正確的一言堂，不但排擠、更致力於消滅不一樣的觀點和立場。可以說，今天的普世化的第三代女權主義實踐已經完全喪失了其賴以生存的去中心化立場，成為了新一代急需挑落的“知識霸權”。

問題在於，我們經常默認一般意義上迥異於這種“普世化”卻仍然在世界上有著舉足輕重地位的政治實體應當承擔領銜反制這種“普世化”的角色，但實際的情況則與之相反，我們看到的不是政治實體的一馬當先，而是其面對這種根植於西方中心主義與霸權主義的新型“顏色革命”，在很多時候都呈現出弱勢，然後通過損害非該理論消費群體的利益來進行妥協的趨勢。

這種情況固然同政治實體置身於全球化經濟鏈條關鍵位置的經濟基礎有關，卻也不能否認另一種要素，筆者在之前的文章中提到過有關“媒體權力”的概念，但媒體無論如何也只是媒介、是中介，建構出種種推行“性別治理”的文化消費品的並非媒體本身，而是有能力去建構這些東西的知識分子們（廣義）。

為何監管缺失：“統治即令人信服”

何春蕤在《性別治理》一書中總結了性別治理在臺灣的三個層面的表現（筆者強烈推薦有條件的讀者去看原書）：

1. 性別治理鑲嵌在臺灣內部政黨政治的競逐中，借著滿足執政黨對統治正當性的需求而進入體制內發展的同時，也運用資源來生產承載著國族定位欲望的知識與情感。
2. 性別治理已經成為臺灣行銷國族定位和國際地位的展示櫥窗。

J.K.罗琳声援反跨性别言论，被《哈利波 特》粉丝“开除”作者身份

环球网
2019-12-23 03:52 | 环球网官方微博

【环球网驻英国特约记者 孙微 环球网特约记者 刘皓然】“罗琳就是讨厌跨性别的激进女权主义者？”……因声援一位遭遇职场不公待遇的普通女性，英国著名作家、魔幻文学《哈利·波特》系列作者J.K.罗琳近日陷入一场大规模网络讨伐，被所谓的LGBT（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人士）支持者贴上各种带有贬损含义的新标签，大批“粉丝”纷纷宣布“脱粉”。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一些无法接受她这种立场的《哈利·波特》粉丝，干脆“开除”了她的作者身份。

3. 通過司法改造，性別治理翻新強化了女性主義“私人的就是政治的”概念的含義。這個“政治的”不再只是籠統的描述權力關係，而是被具體化成為需要法律處置的壓迫和傷害。

從何春蕤的總結中我們可以看到，雖然享用“性別治理”的文化消費者與知識生產者日常表演「脫了褲子騙庭杖」以示自己在體制內所處的“邊緣性”，但其與所處體制的聯繫反而遠比反對者們要深刻（固然這是何春蕤總結的“臺灣經驗”，但在四小龍成為歷史，大陸開啟新一輪城市化進程的現在，我們同樣要面對城市化帶來的意識形態結果）。

其實這個情況並不難以理解，廣義上的第三世界社會精英們熱衷於花費不菲的資源將自己的子女投身於階級再生產中，而在大學這個完成當代知識／階級生產與再生產的地方，知識分子們則表演與傳授著如何運用隱性權力支配社會階層、國家和國際政治關係的技法與經驗。（考慮到歐美本身的一些新聞，“第一世界”其實也同樣深陷其中）

法國哲學家雷吉斯·德佈雷在《法國的知識權力》一書中指出，知識分子們聯手“新媒介支配”（*nouvelle médiocratie*，*media* 即“大眾傳播方法”——或針對大眾基層進行觀點生產的方法-*kratein* 即“支配”），試圖與新媒介純粹徹底地融合，在日漸龐大的圍牆內為知識分子們確保新聞事件、價值、事實、象徵性標準的壟斷性生產與流通。

這種“新媒介”支配，在本次的“上野千鶴子的異世界歷險記”事件中體現的尤為突出：畢業於我國兩大知識權力代表大學之一的新媒體操盤人，通過一個市場營銷意義上的“PITCH”完成了對“文化人”群體的新一輪流量密碼與時尚單品的推銷。

如果這樣的行為僅僅是獲得了經濟上的利益也就罷了，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消費品，文化消費品是一種可以不斷在消費者腦海中進行再生產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上，“知識”本身在這種消費過程被腐化了，而知識分子卻通過以融入主流傳播方式的手段，有意無意的攫取了社會的至高權力，同時榨取了屬於多數民眾的利益，成為了新自由主義經濟結構當中的幫兇。

回到第一部分提到的那篇文章說的“女性主義者鄙視鏈問題”，筆者認為客觀上，這幾年對於上野千鶴子的熱捧是原因之一。其實我們看這個視頻，能感覺到上野本人的言論觀點的溫柔和包容，並不是全然的激進，但為什麼國內很多看了，或者聲稱看了她的書的人，在互聯網的日常活動中最終開始呈現極化趨勢？這就是我們前面說到的，“性別治理”範式往往體現出無限上綱，罔顧國情世情人情的特點。

可以這麼說，當上野千鶴子的“暴論合集”堂而皇之的通過遵守消費市場邏輯從而遍佈全國的高鐵站點書店與成為各種購物 app 與電子書 app 的座上賓時，上野千鶴子無論在個人意義上怎麼樣否認自己同新自由主義的聯繫都顯得有些蒼白，即便我們去區分作為學者的上野千鶴子與作為“性別治理”符號的上野千鶴子。

比如上野千鶴子對日本女性不只需要照顧自己的父母的雙親，也要照顧婆家的雙親，若兼要撫養小孩，丈夫卻因大部份日本公司都要求長時數工作的情況的評論是“別指望另一半會幫什麼忙”這樣的將性別矛盾置於階級矛盾之上。

這對於上野所批判的日本來說，可能是一種適用情況。然而，國內布爾喬亞文化消費群體的家庭往往是受益于中蘇社會主義實踐的雙職工家庭，父母分別負擔一部分家務，只有 ta 們自己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結果，上野相關著作在我國受到熱捧之後，這種言論就往往也被不加前提不加具體情況的完全套用到我國的性別問題上。更不用說右面這種內容，這到底是可以拿來當作普遍批判的“武器”，還是基於某個國家文化特性產生的一種觀念？

如果可能，一辈子也不让女儿离开身边。妻子只是至终也不能相互理解的异形的他者，而女儿总还有几分自己的克隆，也是自己精心养大的，有种如皮格马利翁一般〔原注2〕的对自己苦心之作的爱恋。女儿才是“至高的恋人”。比起妻子，更愿把女儿放在身边。要是可能，与女儿交媾成双，自闭在无底的黑洞中，享受无上的幸福，成为女儿“一生唯一的男人”。这，不是父权制下男人们的一种“终极梦想”吗？

對於前文提到的那種“無限上綱，罔顧國情世情人情”是否必要，我們不妨看看北京大學的李楊老師在其著作《文學史寫作中的現代性問題》中的這段話：“女性主義批判的真正革命性意義絕不在於以女性的經驗取代男性的經驗，以文化價值秩序中的邊緣性奪取文化價值秩序中心的中心性，並且使之普遍化為人類文化的價值新規範。如果說女性主義之所以提出並強調文化秩序中的邊緣性（marginality）地位這一概念，是為了意識到並且向文化的中心性回歸的話，那麼，這無異於扼殺了這一概念的強大生命力”。

筆者手上這本《文學史寫作中的現代性問題》出版於 2018 年，書中提到的這種“邊緣的再中心化”在今天的實踐中其實已經不鮮見了。在這個意義上，思考如何對知識本身進行祛魅顯得勢在必行。

當代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奠基人、加拿大學者達拉斯·斯邁斯在其論文《自行車之後是什麼》的最後提出了一個叫做“文化甄別”的概念，他認為“社會主義的文化篩選系統的確面臨嚴重的問題，而這一系統對於保護社會主義文化的幼苗是必要的，以使其不被滲透在資本主義文化中的個人主義倫理所淹沒”。

《自行車之後是什麼》是斯邁斯對技術中立主義進行反思的代表作，而他文章中的“技術”也是同其他對技術中立主義進行反思的理論一樣，更多指代的是“自然科學”領域的“技術”具有政治性。筆者在這裏將其延伸，即“技術／知識”的政治性絕非獨屬於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一樣有政治性，且這種政治性的程度恐怕要比一般意義上的自然科學深得多。

在今天去強調社會科學固有的意識形態屬性／政治性是一件很諷刺的事情，因為對於一度扛起社會主義大旗的中蘇兩國來說，這個論述在很長一段的歷史時期裏屬於路人皆知的領域。放棄對外輸出意識形態多年後，雖然今日也不乏對這種“帝國主義文化侵略”進行批判，可惜大多數批判者仰賴的方法論也是來源於“帝國”的文化帝國主義批判範式。

如果這還不夠可悲的話，筆者可以提供另一個例子。在閱讀一本號稱“新傳考研必讀”的國內傳播學扛鼎學者所著的教科書中，筆者發現其同樣介紹了文化帝國主義的概念，這個在現實實踐中並不處於優勢地位的批判範式在書被總結了 7 條不足，而這七條不足，如果我們用上文所提到的“文化甄別”的方法論去審視的話，我們會發現其遣詞造句無處不透露著對“世界公民”和“文化多元主義”這兩個充斥著意識形態輸出概念的迷信（這個相關專業有興趣的可以自行查閱筆者指的是哪本書的哪部分）。

當這樣的“知識”以一種看似“中立”的方式介紹給大學學生時，我們又怎能不悲哀的發現國內的新聞傳播從業者各個都已經是“帝國”的擁躉了呢？丹·席勒在《傳播理論史：回歸勞動》中描述了激進派對文化帝國主義的定義，“一個社會被引導進現代世界體系的所有過程之總和，主流階層在此過程中被吸引、承受壓力和壓迫，有些時候則是形同受賄，以塑造本國的社會典章制度，使其對應或甚至提升位於世界體系核心的主流國家的價值與結果”。

在今天看來，這樣的定義在過去明顯被低估了其所能涵蓋的範圍——“文化帝國主義”在大部分時候被理解為對美帝國主義私有媒體和大眾傳媒工業反制的武器，然而我們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所忽視的可能恰恰是其最重要的部分：主流階層在此過程中被吸引、承受壓力壓迫乃至形同受賄的，並非只是“典章”（典制、法令制度），更是構成典章的知識。無怪乎席勒強調文化帝國主義批判範式僅僅是將第三世界人民以鮮血與汗水為代價獲得的反殖民抵抗經驗，重新導入中心國家的思考罷了。

這樣的情況恐怕不只是發生在傳播學領域，筆者以前提到過所謂“帝國民主”（Imperial Democracy）的概念完全可以拓展到整個社會科學領域——套用學者趙月枝對“帝國民主”的描述，我們可以對“帝國知識”（Imperial Knowledge）有個清晰的認識：

“知識”一旦失去國際社會主義視野，變成了“帝國知識”內部的批判性改良主義研究，就不僅無意間擁有了與美帝國體制“共謀”的線衣，而且因為其在現有全球學術體系內佔領了“魚與熊掌”兼得的道義制高點，更容易成為霸權性的學術話語，進而與那些滿世界推廣西方“普世價值”的“全球市民社會”組織一道，成為帝國主義的“道義幫兇”或“學術幫閒”，“精神貴族中的精神貴族”，在反華反共中形成“左右合流”

所以筆者也要在這裏強調，對於中國而言，對自然科學的政治性反思的優先度應當是遠不及對社會科學的政治性反思的優先度的。

如果我們要真正完成對過去幾百年間人類歷史的反思，我們恐怕需要無數的學者與大眾一起努力。然而不幸的是，知識分子群體作為在過去幾十年間形成主導地位的中產階級代表，事實上在全球市民社會中構成了資本主義統治的中流砥柱。老生常談的“公民社會”與國家的分離使得“知識分子”們同他們生產與再生產出來的知識一起，成為社會中有實質權力的高層時，卻以公民社會的英雄形象自居：有一切權威優勢，無任何權力羈絆。

這樣的例子，只要我們還看新聞，還關注社會，就絕不缺乏。事實上，最近發生的“安徽合肥教授言論事件”中我們就可以看到，當這位教授發表了充斥著拜金主義、性別歧視、國族歧視的言論後，平日熱衷於使用後現代主義、解構主義、女權主義話語的消費者們紛紛裝聾作啞，更有甚者斥責這位學生搶奪麥克風的行為是所謂不尊師重道、不尊重言論自由。為什麼呢？就是因為這個學生說出了“讀書是為了中華民族復興”。

這種德佈雷所言的“知識分子黨派”再一次展現出其巨大的同調性：這些看起來無黨派的個人主義者構成了一個隱藏在水面之下的特權階層，儘管是一個非正式的團體，但這個等級井然、同社會各界深度接合的權力團體，通過反對一切權勢（除了自己）為專職，施展馬基維利意義上的“令人信服的統治”，這種統治相較於系統本身更加有效和深刻，最不明目張膽的並不意味著性能最差，某種意義上性能甚至是最好的。

“安徽合肥教授”的暴論，在被曝光前十分受到市場經濟的歡迎，這似乎完美證實了阿芒·馬特拉的論述：

“因為文化的資本化也是主體階層的資本化，讓現存的公民－消費者越來越受制於設備、職業和特殊文化背景的剪裁。對文化實行商品經營，是生產新型的主體性。恰恰是因為這種主體性管理的質的變化，使得文化的利害關係具有同樣的戰略重要性。”

《世界傳播與文化霸權》一書的代譯序中進一步指出，這種文化資本化擴大了社會階級和社會階層的象徵差別，更嚴重的是由商業利潤主導的文化交流背後隱藏了新的權力形式和新的社會整合形態，在後現代的話語中意味著社會的終結、社會意識的蒸發、社會意義的缺失，乃至放棄價值的理性基礎直至民族國家概念的淡化和消失。

民族國家的思想是法國大革命以來的共和思想的一個基本內涵。按照法國著名哲學家亨利·勒菲弗爾（Henri Lefebvre）的觀點，國家是秩序和聯繫的要素。但是在傳播全球化時代，國家這個宏觀主體同時面臨著國際化和地方化（或區域化）的威脅，而後者的形成往往是以更加明顯和更加給人好感的形式出現，是媒介擴大影響力指數所瞄準的對象。我們所認為的國家消亡，應當是在人類整體朝著共產主義形態邁步中的過程進行，但顯然不應該是以新自由主義的形式，首先讓第三世界國家們消亡。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對當前秉持著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媒體集團在在新生產出的文化消費品中，熱衷於強調與後現代主義高度相關的身份政治與性別治理的現象有著批判性的理解：這絕不是什麼新的科學技術、新的生產關係、新的社會關係，這依然是帝國主義試圖摧毀第三世界國家抵抗意志的陰謀與陽謀。

後記

筆者從巨人們的身上偷取了他們的一部分力量，拼湊出這個論文不像論文，新媒體文不像新媒體文的東西，文章雖然很長，但真心期待讀者們看完後能與筆者進行探討，如果各位讀者在閱讀後能夠通過各種渠道取來筆者提到的原典自行加以研讀和思考乃至輸出，那就是對筆者最大的鼓勵了（當然，筆者也不拒絕第二大的物質鼓勵）。

READ, THINK and WRITE。只要做到了這三點，你同世界名校的距離不過是一張文憑罷了。在這個工作崗位緊缺的年代，相信已經有不少讀者發現那真的只是張紙了吧。

與君共勉。